

陈叔通与人民政协

孙贝贝



陈叔通(中)参加开国大典

陈叔通所谓“友方”即中国共产党。

更生日 共肩未来盛业

1948年4月,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“五一”号召,并征询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的意见。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宣言和声明拥护“五一”号召并起而响应,陈叔通亦积极响应,并对召开新政协的时间、地点、议程和参加成员等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建议。

在陈叔通看来,“新政协不宜在两国形势下实行,至少须军事奄有黄河以南或大江一半以上。至于实践,须随军事发展而能有所决定。总须北局有决定性,然后可以到大江以南(稳扎稳打为不易之理,不是打来的,便不能彻底。辽、晋、陕、蜀决定,立脚方稳)。新政协期以为不可急”,建议“新政协就在北平”,并且指出“军事进行愈顺利,愈可迟开,我此建议自以为极有价值,不可忽视。”

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,陈叔通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将成为共产党最后制胜的“意外之机会”,“前日忽改革币制……此实为友方意外之机会……不到一月,必起风波,此风波无法可以镇压。草头(指蒋介石)亦说,只许成功,可见其心已虚,并报纸已明载倦勤之说,此即为卷逃埋伏之笔。”10月16日陈叔通致信马叙伦,说:“意外机会即指币制改革,其成果即借此抢到黄金美钞……不一月,经济恐将总崩溃。”陈叔通深知经济和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,多方为中共推荐外交、行政、教育、交通、出版等方面的人才,手札多处体现他为中共的人才问题操心,强调要重视经济建设,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闪光的真知灼见。

从1948年8月起,中共中央即着手布置民主人士北上的相关事宜。中共地下党邀请陈叔通到解放区参加会议,共商国家大事,陈叔通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陈叔通于1949年1月潜赴香港,在离沪前曾对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期说:“你要把银行保护好,并联络同业,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。”2月27日,陈叔通与柳亚子、叶圣陶、郑振铎、马寅初、曹禺、王芸生等人到达解放区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高度赞扬。毛泽东对陈叔通极为敬重,曾对陈叔通说:“叔老,您是清朝的翰林,经历了几个时代,经多见广,经验丰富。您的经验是宝贵的!为了建设我们和平、民主的国家,希望您要直抒己见,切莫保留。”到了北平后,毛泽东还不时地请陈叔通去香山会谈,共商建国大事。

上海解放后,陈叔通同许多上海的民主人士一起回到上海,向广大市民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,传达解放区的见闻,对大家起到了鼓舞作用。他还和黄炎培、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工商界劳军分会,筹集物资,慰劳解放军。

1949年6月15日,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,陈叔通被推选为筹备会副主任,他以“万分光荣和万分欣喜”的心情发表讲话,向中国共产党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。他呼吁各民主党派派员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加强并巩固民族统一战线,呼吁全国产业界“尽量发挥爱国的创造与牺牲精神”,为发展生产、恢复国民经济加緊努力,以此表达对新政协的支持。

茅盾文学奖的由来

林传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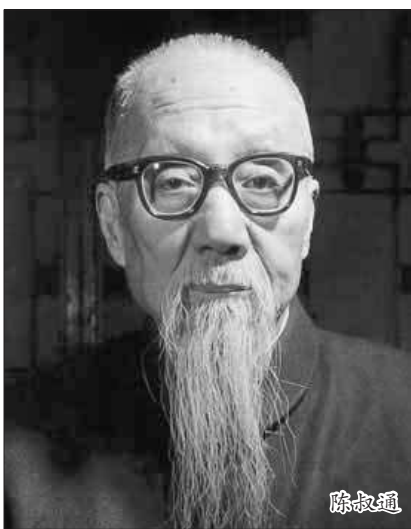


发现和培养大批青年作家

茅盾很早就从事文学评论工作,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他做编辑,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,发现和扶持了不少有潜力的新作家。

青年诗人戴克家拟出版第一部诗集《烙印》,但是屡遭多个书店老板的白眼后,不得不个人出资寻求刊印,茅盾获知后,颇为感慨,认为有必要为这本诗集做点什么。他在第5期的《文学》月刊上发表文章《一个青年诗人的“烙印”》,赞扬这是一本“不肯粉饰现实,也不肯逃避现实”的来自“平凡生活”的诗集,称作者是“青年诗人中”最“优秀”的一个。

张天翼的短篇讽刺小说《华威先生》也是经茅盾之手发表在其主编的



陈叔通

“他是我的老师,也是真正的知音。”有人做过统计,茅盾一生评论的作家多达313人,除五四以来的一批老作家鲁迅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徐志摩、丁玲等外,更多的是如沙汀、吴组缃、萧红、张天翼、阳翰笙、臧克家、姚雪垠等30年代后新涌现的作家,以及20世纪五十年代茹志鹃、王愿坚、杨沫、陆文夫等众多新一代作家。

生命为事业燃烧直至最后一刻

1978年,茅盾写了一篇“关于培养新生力量”的文章,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年轻作家的期待。他通过自己的经验,谈认识,谈感想,甚至谈技巧。同时结合50年代专业作家扎根基层,实行“三同”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,突出“生活根据地”的概念,建议年轻作家也可以有意识地建立“生活根据地”,做到“广博”“深入”,努力耕耘,提高自己。他还在《人民文学》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:“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,富于创造性的作家,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,驱遣各种体裁,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。盛世出奇才。”这里,茅盾用“奇才”寄望于新时期作家们。

也是在1978年,茅盾在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,面对着新时期涌现的一批优秀作者,倍感欣慰,满怀希望地说:“我相信,在这些

9月21日至30日,陈叔通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,被选为政协副主席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

10月1日下午3时,陈叔通参加开国大典,这一年他73岁。他写道:“七十三前不计数,我犹未冠志腾霄。溯从解放更生,始见辉煌革命天。大好前程能到眼,未来盛业共加肩。”

开新局 犹未冠志腾霄

1951年2月,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,指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,准备建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。陈叔通德高望重,同工商界和银行界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,政协全国委员会推定陈叔通、李维汉、章乃器3人共同负责,筹建工商界全国性组织。1952年6月,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召开,陈叔通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。1953年10月,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,肩负着引导私营工商业积极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艰巨任务。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。

1954年9月,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,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,作为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。陈叔通作为政协副主席,继续积极参与工作。

陈叔通还为钱学森富有传奇色彩的归国历程作出了贡献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在美国的钱学森买好车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,但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阻挠,无法回国。

陈叔通是钱学森的同乡和前辈,是其父亲钱均夫和岳父蒋百里的老师。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友人,钱学森向陈叔通发出求救信,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帮助回国。

1955年6月15日,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把信件寄到比利时,再由比利时转寄中国。7月11日,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件后报至周恩来处。

8月1日,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,中方代表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谈判中公布了钱学森的信,拆穿了美方代表的谎言。在事实面前,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方达成了允许平民回国的协议。

9月7日,陈叔通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:“您6月16日的信件收到。美国驻日内瓦大使通知,禁止你离开美国的命令已予取消。你可以随时离开美国。电告归期,告知我任何困难。”

9月17日,钱学森终于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,实现了他的归国梦。

1966年2月17日,陈叔通在北京去世。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,由周恩来主祭,邓小平、彭真等陪祭。毛泽东得知陈叔通去世的消息时,悲痛地说道:“共产党人又失去了一位诤友!”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)

人中间,会产生未来的鲁迅、未来的郭沫若。”言之殷殷,情之切切。当时的茅盾身居要位: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文联名誉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。

然而,当时的情况,又是一个百废待兴,文艺的春天,呈现的其实只是从冰霜冻土里刚吐出的嫩芽。

1945年6月,重庆文化界为茅盾举行50寿辰暨文学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。活动现场,有企业家捐赠10万元给茅盾(后来由于各方捐赠,奖金增加到30万),作为茅盾文艺奖金,茅盾交给“文协”,希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。为此“文协”专门成立了由老舍、靳以、冯雪峰、叶以群等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,并派出征文启事,征集到作品上百篇,评选出甲乙丙等优秀作品。这在当时这可能不过是“活动现场”的一个“小穿插”而已,但茅盾应该是个有心人,“奖项”给了他启发,他要创立一个长期的激励机制。

1978年开启的优秀中短篇小说评选说是茅盾在茅盾的提议下举办的,但由于种种原因,未设奖金(指初期)。

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,茅盾捐献出毕生的稿费积蓄25万元设立茅盾文学奖。茅盾在遗嘱里是这样写的:“亲爱的同志们,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,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赠给作协,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,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我自知病将不起,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。”25万元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额,一般人也许很难理解,然而他却把它视为一种比善举更崇高的责任,他要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再燃烧一次——用生命寄望,与文学同在,与青年同在。

1982年12月茅盾文学奖开评,评选已逾11届,共评出优秀长篇小说53部。(作者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)



梁思成首提北京中轴线

周惠斌

首次提出北京“中轴线”概念的人,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,他把中轴线上高低错落、跌宕起伏的建筑群,形象地比喻为“凝固的乐章”。

早在1932年,梁思成在《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》一文中,总结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时,就提出了“南北中轴”的说法。1944年,梁思成在新出版的《中国建筑史》一书中,首度公开使用“中轴线”一词:“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,清官及北京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,为正中之中南北中轴线……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……为天下无双之壮观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梁思成致力于北京城的保护与规划建设。1951年2月19日至20日,梁思成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《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》,又一次明确提出了“中轴线”的概念。文章最后高度评价:“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……

蕴含了优秀的传统文化,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,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。”

1951年4月,梁思成在《新观察》第二卷7—8期上发表《北京——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》。他在文章第四部分“北京的城市格式——中轴线的特征”中写道:“一根长达八公里,全世界最长,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。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。前后起伏、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,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。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、一贯到底的规模……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,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,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。”“无论东方、西方,再没有一个民族对中轴线对称如此钟爱与恪守。”并将北京中轴线形容为“是有音乐节奏”的,是有层次、有高峰、趣味深长的壮阔画卷。此后,“中轴线”一词作为北京地理术语被广泛使用。



张伯苓的朴实

张雨

张伯苓相继创办了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,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,由此他得了个“化缘和尚”的绰号。张伯苓把募捐到的资金登记造册,账目完全透明化、公开化。他坚持把钱花在刀刃上,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浪费,更不允许落入私人腰包。他的生活始终朴实无华,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。

张伯苓深信俭可养廉的道理,婚后他曾对夫人说:“教育是清苦事业,所入无多,家中事悉以累汝。”为了支持张伯苓创办教育事业,夫人一个人料理一切家务事,张伯苓则一心扑在教育上。为了节约经费,他出行很少坐车,无论是上下班,还是去市里开会,他都一路步行。于是,有人送给他一个雅号“11号车”。

张伯苓去北京出差,永远坐三等车厢,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、管

吃管住的小店。老舍和曹禺称张伯苓是一个“不吸烟,不喝酒,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”的人。不过,张伯苓开始是吸烟的,后来只是为学生做榜样才戒掉的。有一次,张伯苓在校园里发现了一个抽烟的学生,就教育学生说,吸烟有害健康,要把烟戒掉,以后不要再吸了。谁料,学生却振振有词地对张伯苓说:“校长,您不是也在吸烟吗?如果您能把烟戒掉,以后我就不吸了。”就这样,学生一句调侃的话,张伯苓却认真对待,从此他真的把烟戒掉了。他戒烟的消息传开,使每一个学生敬佩不已。

张伯苓名满中国时,依然居住在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。一次,少帅张学良慕名来访,汽车跑了好几趟,才终于找到了“校长公寓”。事后,张学良对记者惊叹道:“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,他的朴实令人敬佩!”



丁玲筹办文学研究所

王剑

1950年,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。她受到访问苏联时参观高尔基文学院启发,也想在新中国创办一座培养作家的学校。

丁玲的想法与中央领导的思路不谋而合,毛泽东、刘少奇先后与丁玲谈话,让她尽快行动起来。丁玲便以中国文联的名义,向文化部写了建议书,很快获得批准。不过,丁玲担任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会主任。

在筹建过程中,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具体而有力的支持,从紧张的预算中拨付了1800匹布,作为经费。丁玲看中了鼓楼东大街103号一个宅院,经过商议,按当时的交易方式,以200匹布外加几石小米,买下了这座大院。经过整修,又采购了5万多册旧图书,中央文学研究所便有了雏形。

1951年1月8日,中央文学研究所举行了挂牌仪式暨首届开学典礼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界的一个伟大事件,郭沫若、茅盾、周扬、叶圣陶等嘉宾都来祝贺,典礼简

朴而庄重。

丁玲为学员制订了“自学为主,教学为辅,联系生活,组合创作”的16字方针,课程内容涉及文学史、文学理论、现代文学等;强调学员的学习主动性,提倡学员之间的互学。因为丁玲的人脉关系,文学研究所的师资力量颇为雄厚,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艾芜、郑振铎、俞平伯、叶圣陶、赵树理、何其芳等有影响的作家、学者,都担任过文研所的教职。

丁玲主动担任学员的辅导老师。她手里拿着学员的花名册,每当同学说出自己的名字,她对照名单端详一番,并“嗯”一声,生怕记不住似的。有时会把学员叫到她所居住的福巷寓所开座谈会。丁玲很真诚,给学员看稿子、提意见,总是一针见血,从不拐弯抹角,深受学员的爱戴。

中央文学研究所一共举办了8期培训班,培养学员454名。丁玲八十大寿时,有个学员赠她一首诗:“江南风雨塞北雪,立笔横枪斩红尘。文章有声皆动魄,生涯无字更惊魂。”



贾平凹名字的来历

崔鹤同

贾平凹出生在陕西省丹凤县金盆村,他的父亲贾彦春在金盆的南寺小学教书。平凹娘寄住的这户人家姓李,为了纪念儿子出生的顺遂,贾彦春给他取乳名贾李平。在贾家明堂,贾平娃排行老八,人喊他“平娃”,后来单唤一个“平”字。

贾平娃从小爱读书,也喜爱涂脚。1971年,他19岁时,第一次正式向报社投稿。1972年4月,他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,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文学作品,竟没有一篇变成铅字的。于是他四处求教,拜访作家诗人。求教的结果是,回来赶紧学习“充电”,刻苦攻读古典文学,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《古文观止》等等,一边不断地写作练笔。1973年8月号《群众艺术》上发表了他和同学冯有源合作的革命故事《一双袜子》。这次他署名贾平凹。不过,《群众艺术》发行量小,很快便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众多刊物中。

这年10月的一天,天气转凉,20岁出头的贾平娃,缩着瑟瑟发抖的身子,把两条裤子送到钟楼邮局附近的铺子去缝补。等待的时间,

他看着大街上一身腈纶衣裤的红男绿女,又切身感受“秋风吹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的萧瑟和凄冷,不由得在邮局广场上跑动驱寒。他无意中朝花园旁边的报摊上瞥了一眼,立即,目光就直了,“贾平凹”三个黑体字清清楚楚地映在眼里!他弯腰细瞧,但见那报纸的右上角有一行大字:深深的脚印。他忍不住“啊”了一声,却急忙转过身,捂住了口,稍稍镇静之后,抖抖索索地摸出了几枚小钱,迫不及待地买了这张报纸。当天夜里,他给父亲亲写了一封信,报告了这一重大喜讯。这篇两千字的散文刊登在《西安晚报》上。这是他第一次在省城发行近百万份的党报上公开发表作品。自此,西安的读者开始注意“贾平凹”的文章,贾平凹也更加努力地读书写稿,文章也越发发表越多。

从此,他一直使用“贾平凹”这个名字。陕西方言,“娃”“凹”同音,改“娃”为“凹”,在于他要正视前途的崎岖和平平,一往无前,矢志不渝,踏平坎坷成大志。2008年,贾平凹凭借长篇小说《秦腔》,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